

# 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考辨

刘飞滨<sup>1</sup>, 李文玉<sup>2</sup>

(1.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成都 610066; 2. 成都大学 期刊中心, 成都 610106)

**摘要:**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是在一系列投谒失败后另辟蹊径继续寻求进身之阶的行为, 有着明确的目的性。这个问题, 从“五陵豪”的特殊身份、李白当时所作的游侠诗及李白对“五陵豪”的真实态度中可以得到说明。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而终遭“北门厄”, 之后满怀悲愤离开了长安。

**关键词:**李白; 干谒; 交游; 五陵豪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06.2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5315(2019)02-0154-06

**DOI:** 10.13734/j.cnki.1000-5315.2019.02.020

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之事向来颇为研究者关注, 因为这关系到李白早年经历的认识问题。但迄今为止, 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, 研究者论及于此, 叙述往往比较笼统, 一是将时间大概定在李白出蜀之后到酒隐安陆期间, 跨度很大; 二是对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情况仅是表面性介绍, 主要展现李白青少年时期的豪侠性格和风度; 同时, 对“五陵豪”也只是笼统称之为豪侠, 并没有身份上的考察。比较有代表性的, 如王瑶先生《李白》<sup>[1]</sup>, 王运熙、李宝均先生《李白》<sup>[2]</sup>等著作中的相关阐述。80 年代以来, 随着稗山、郭沫若先生关于李白在开元年间应有一次长安之行的看法的被关注, 朱金城、安旗、郁贤皓、郭石山、李从军、谢思炜、胥树人、杨栩生、薛天纬等先生纷纷参与讨论<sup>[3-13]</sup>, 李白“一入长安”说逐步确立(目前, 研究者多认为, 李白“一入长安”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夏秋间到十九年初夏), 李白早年行踪及诗文创作的具体情况得到很大程度的澄清, 研究者关于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一事的认识也日趋深入。首先, 明确了李白所交游的豪侠乃所谓之“五陵豪”,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天子禁卫军军士。其次, 明确了李白与“五陵豪”交游是在其一入长安期间。具体时间, 据安旗先生考证, 为开元

十九年春<sup>[6]</sup>。再次, 阐述了李白和“五陵豪”任侠放浪的大致情况, 并对李白遭遇“北门厄”之事有所讨论。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, 认识也越来越细致, 但依然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说清楚。比如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原因是什么? 李白当时是怎样的心态? 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情形及遭遇“北门厄”的具体情况如何? 如此等等, 都需要进一步探讨, 以使问题更加明晰。笔者受前辈学者启发, 又细检李白一入长安期间的相关资料, 不揣其陋, 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, 以期能对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一事提供些许看法。所涉李白行踪及诗文创制时间, 皆以安旗先生主编的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(以下简称《笺注》)为据, 文中不再说明<sup>①</sup>。

## 一 李白受张垞冷遇后的行事、处境及心态

要说清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情况, 须从李白投谒张垞受冷遇到最终离开长安这个大背景中去考察。因为, 李白投谒张垞是开元十八年(730)秋天的事, 而他交游“五陵豪”在开元十九年(731)初春, 中间相隔半年多时间。这段时间, 李白的行事、处境、心态如何是说明问题的重要前提。

根据李白在开元十八年秋所作的一些诗歌来看, 李白在张垞处受冷遇后, 虽然处境极为窘迫, 一度失

收稿日期: 2018-09-06

作者简介: 刘飞滨(1972—), 男, 陕西户县人,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、文化研究;

李文玉(1969—), 女, 四川资中人, 成都大学期刊中心副编审, 主要从事期刊编辑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。

望、彷徨,但他并没有因受打击而心灰意冷,这从其《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》二首结尾所言可见消息。其一曰:“吟咏思管乐,此人已成灰。独酌聊自勉,谁贵经纶才?弹剑谢公子,无鱼良可哀。”<sup>[14]110</sup>其二曰:“丹徒布衣者,慷慨未可量。何时黄金盘,一斛荐槟榔。功成拂衣去,摇曳沧洲傍。”<sup>[14]111</sup>在这两段话中,“李白毫不掩饰地发泄了自己的情绪:他在遭到冷遇后,一方面对着主人张垞发牢骚,一方面抒写自己的不凡抱负,感慨张垞不是知遇之人,告诉张垞莫要小看了自己”<sup>[13]22</sup>。如此表达,一来可见李白雄心未泯,二来可知李白定会继续寻求实现抱负的途径,这与他那不低人颜色的气骨、坚韧以求的性格是非常相符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。李白虽对张垞绝望,但他依然在寻找机会。这一点,安旗先生、薛天纬师《李白年谱》在“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,颇受冷遇”条下述曰:

欲谒玉真公主,未果。见《玉真仙人词》,词中有云:“弄电不辍手,行云本无踪。几时入少室,王母应相逢。”故知欲谒未果。

又曾谒其他王公大臣,均无结果。见《行路难》(其二):“弹剑作歌奏苦声,曳裾王门不称情。”又见后作《梁甫吟》一诗:“我欲攀龙见明主,……阊阖九门不可通,以额扣关阖者怒。”<sup>[15]31-32</sup>

开元十八年秋,李白还有《赠裴十四》一诗,可作补充。诗云:

朝见裴叔则,朗如行玉山。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。身骑白鼯不敢度,金高南山买君顾。徘徊六合无相知,飘若浮云且西去。<sup>[14]125</sup>

李白对裴十四是一种欲迎还拒的心态,亦未用尊称,“盖因裴某无礼贤下士之风,白遂有平交王侯之概”<sup>[14]127</sup>。虽然如此,李白希望被擢拔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。《笺注》云:“裴十四,或为裴光庭。”“裴楷(叔则)曾为中书郎,见《晋书》本传。裴光庭,开元中曾为中书侍郎,见《唐书》本传。”<sup>[14]125-126</sup>可参看。李白的诸多投谒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,但可以看到的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。

李白在长安待至暮秋,有岐、邠、坊之行。李白游历澄怀、访古揽胜,诸如太白峰、凤女台、新平楼等地皆有其足迹,这抑或带有遣愁排闷的性质。当时,李白穷困潦倒,但他依然逢机便行求荐之举,孜孜以求宏伟抱负的实现。

本年初冬,在邠州。李白有《鬲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》一诗:

鬲谷稍稍振庭柯,泾水浩浩扬湍波。哀鸿酸

嘶暮声急,愁云苍惨寒气多。忆昨去家此为客,荷花初红柳条碧。中宵出饮三百杯,明朝归揖二千石。宁知流寓变光辉,胡霜萧飒绕客衣。寒灰寂寞凭谁暖,落叶飘扬何处归?吾兄行乐穷曛旭,满堂有美颜如玉。赵女长歌入彩云,燕姬醉舞娇红烛。狐裘兽炭酌流霞,壮士悲吟宁见嗟?前荣后枯相翻覆,何惜余光及棣华?<sup>[14]132</sup>

在诗中,李白绘零落之景、诉凄凉之情、言落魄之境、赞李粲之荣华,皆是希望得到李粲的援引,恹惶之况,令人感慨万端。李白的感情之所以如此强烈,是因为他依然壮烈在怀。这样的感情,在其《赠新平少年》一诗中有更为淋漓的抒发:“韩信在淮阴,少年相欺凌。屈体若无骨,壮心有所凭。一遭龙颜君,啸咤从此兴。千金答漂母,万古共嗟称。而我竟何为,寒苦坐相仍?长风入短袂,内手如怀冰。故友不相恤,新交宁见矜。摧残槛中虎,羁绁鞴上鹰。何时腾风云,搏击申所能?”<sup>[14]135</sup>李白借韩信从穷困潦倒到建立不世之功业的事迹浇胸中块垒,堪称回肠荡气!《笺注》云:“李粲,瞿、朱注:‘《新书》世系表,赵郡李氏东祖房有粲,濮州刺史,或其人后迁此官。’”<sup>[14]132</sup>可参看。

开元十九年初春,在坊州。李白有《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》一诗:

游子东南来,自宛适京国。飘然无心云,倏忽复西北。访戴昔未偶,寻嵇此相得。愁颜发新欢,终宴叙前识。阎公汉庭旧,沈郁富才力。价重铜龙楼,声高重门侧。宁期此相遇,华馆陪游息。积雪明远峰,塞城锁春色。主人苍生望,假我青云翼。风水如见资,投竿佐皇极。<sup>[14]136</sup>

在诗中,李白诉说自己干谒的失败,表达遇见阎正字的欣喜及仰慕之情,最后挚言希求提携之意。落寞之状、殷切之望,与《鬲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》一诗从根本上讲无有二致。关于阎正字,《笺注》云:“王注:‘按《宝刻丛编》,天宝中太子正字阎宽,撰《襄阳令卢僎德政碑》,未知即此阎正字否?’”<sup>[14]136</sup>可参看。

又,李白离开坊州前,有《留别王司马嵩》一诗:

鲁连卖谈笑,岂是顾千金?陶朱虽相越,本有五湖心。余亦南阳子,时为《梁甫吟》。苍山容偃蹇,白日惜颓侵。愿一佐明主,功成还旧林。西来何所为?孤剑托知音。鸟爱碧山远,鱼游沧海深。呼鹰过上蔡,卖畚向嵩岑。他日闲相访,丘中有素琴。<sup>[14]138</sup>

在诗中,李白热切抒发了他意欲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。诗末虽有若不成功便像李斯、王猛贫贱时那样归隐山

林之语,但难掩其对非凡功业之渴望。此诗是写给王嵩的,而王嵩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官员,所以,李白之意或是希望借助于阎正字,恳请王嵩从中成全吧。

稗山先生说,李白出游郾、坊的作品“表现为穷愁潦倒、渴望遇合,显示出进身无门,彷徨苦闷”<sup>[3]</sup>。郁贤皓先生亦云,李白郾、坊之行中的诗篇“反映出他穷愁潦倒、渴望有人引荐,显示出进身无门,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”<sup>[7]45</sup>。二者皆道出了李白西、北之行中的处境和心态。从中,也可看到,李白尽管困窘,却依然怀着“腾风云”“申所能”的雄心和强烈愿望,在不断寻求着实现理想的机会,初衷未变。

## 二 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目的

开元十九年初春,李白结束了岐、郾、坊之行,又回到了长安,他交游“五陵豪”即始于此时。根据上文的梳理,可以肯定的是,他是怀着热望重返长安的。那么,其目的自然仍在功业之念。李白是否继续投谒过相关人等,无从得知,但他交游“五陵豪”则是一件十分突出的事情。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,始于春,终于初夏,长达两、三个月时间,可谓投入。那么,对于心怀大愿的李白来说,这个交游就绝非是为了单纯地交友识友、放浪行乐了,因为它有悖于李白重返长安的目的。所以,这个交游,合理的解释应是,李白想通过“五陵豪”寻得一条实现功业理想的途径。

首先,借“五陵豪”之力以实现功业之望,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《笺注》云:“所谓‘五陵豪’,乃长安至豪门子弟而供职羽林军者。此辈为朝廷所宠,故骄横跋扈,不可一世。”<sup>[14]153</sup>阎琦先生进一步分析道:在唐代,京师禁卫军包括“南衙十六卫”和“北衙六军”(安史之乱后扩为左右十军),人数达四五十万之众。“南衙十六卫”以防卫皇城及京城为主,“北衙六军”以防卫宫廷禁苑为主,为皇帝的亲兵。京师禁卫之兵,尤其宫廷禁军,自汉代以来即多取关西六郡“良家子弟”。李唐出自陇西,故六郡“良家子弟”即为其子弟兵。六郡子弟历世为将官,其后代也多习武艺,成人之后即赴边庭,立战功,或选送禁军中。另外,在唐高祖时,又有所谓“元从禁军”,即李唐王朝建立后愿留宿卫者,共三万人。这些人在年老之后,其职位由子弟代替,谓之“父子军”,更是带有世袭性质的职业禁军。所以,唐代的京师禁卫军军士多为将门之后、贵胄子弟。在不值班时,很多军士便以游侠自居,鲜衣怒马,呼朋引伴,斗鸡飞鹰,纵酒豪赌,挟妓浪游,成为京师长安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。人们沿用汉代以来的旧称呼其“羽林郎”,或从其高贵的身份称之“五陵年少”“五陵豪”

等。<sup>[16]319-324</sup>京师禁卫军军士,尤其是宫廷禁卫之兵,因其特殊职位,要接触皇帝自有很多便利;因其特殊的家世背景,自有广泛的社会关系,所与交通,同等门第者自不必说,就是皇室成员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,心怀功业之望的李白,重返长安后与之交游,不能说没有任何目的性。纵观李白一系列干谒的失败,笔者以为,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,是一种自然的思路上的调整,是一种从投谒达官贵人的寻常路到别作他求、不走寻常路的转换,是一种山穷水复疑无路中的试图突破。这些都是符合李白的性格特点及其当时的处境的。

其次,李白在交游“五陵豪”期间作有六首游侠诗,除《少年行》其二及《少年子》为赞美禁军侠少潇洒日月、放浪不羁、蔑视礼法的风采外,其他四首都是借游侠形象抒发强烈的功业渴求,从中也可说明问题。诗如下:

赵客缦胡纆,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闲过信陵饮,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,持觞劝侯嬴。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,意气素霓生。救赵挥金槌,邯鄲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,煊赫大梁城。纵死侠骨香,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,白首太玄经。《《侠客行》》<sup>[14]142</sup>

击筑饮美酒,剑歌易水湄。经过燕太子,结托并州儿。少年负壮气,奋烈自有时。因声鲁句践,争博勿相欺。《《少年行》其一》<sup>[14]145</sup>

龙马花雪毛,金鞍五陵豪。秋霜切玉剑,落日明珠袍。斗鸡事万乘,轩盖一何高?刀摧南山虎,手接太行猱。酒后竞风采,三杯弄宝刀。杀人如剪草,剧孟同游遨。发愤去函谷,从军向临洮。叱咤经百战,匈奴尽奔逃。归来使酒气,未肯拜萧曹。羞入原宪室,荒径隐蓬蒿。《《白马篇》》<sup>[14]150</sup>

燕南壮士吴门豪,筑中置铅鱼隐刀。感君恩重许君命,太山一掷轻鸿毛。《《结袜子》》<sup>[14]144</sup>

这四首游侠诗产生于同一时期,堪称一个系列,是李白其他时期的游侠诗创作所没有的现象,绝非偶然或巧合。安旗先生在谈论作品解读时说,一个作家同一时期某些作品之间有必然联系,“考察这些联系,我们就会找到作品的前因后果,来龙去脉;同胞骨肉,三亲六眷;沉思翰藻,意内言外……从而达到认识他们本身。考察的联系愈深广,掌握的中介愈充足,对事物的认识也愈准确”<sup>[17]5</sup>。这段话是安先生学术研究的深刻体会,也为我辈提供了有益的指导。李白这四首游侠

诗就是有着联系的诗,联系的根本点即诗人强烈的功业渴求。前三首诗皆为赞美游侠风采——抒写不甘贫贱的模式,通过对比以抒情。赞美游侠,言其开张意气、不羁性情,而突出的则是被世人仰慕的功业,内中颇含羡慕之情;抒写不甘贫贱,虽只有诗末二句,然四两拨千斤,诗人愤然之意、踌躇之志跃然于前。第四首诗,表面上是对君子死知己的激烈恩报观念的颂扬,实则激越地表达了一种若得相助定不敢忘恩的感念之情,希求援引之意甚为迫切。两组诗在思想情感上既统一,又有着呼应,清晰地展露出李白心中的强烈系念。而四首诗都产生于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生活情境中,所借以言怀者皆为建有功业的古代名侠或眼前侠少,所抒之情可谓有感而发。如此种种,皆折射出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目的所在。

再次,李白虽然在诗歌中赞美“五陵豪”,但他内心中对这一群人是有不满的。这从《白马篇》和《行路难》二诗可知。关于《白马篇》,元萧士贇云:“此诗寓贬于褒,寄扬于抑,深得国风之旨,读者宜细味之。”<sup>[18]109</sup>《笺注》亦认同萧氏的看法:“此诗盖作于初交之时,虽颇有羡慕之情,然亦不无贬刺之意。”<sup>[14]153</sup>细品此诗,可知萧氏和《笺注》眼光之独具。表面上,李白对“五陵豪”飒爽的英姿、斗鸡事主的荣光、武艺的高强、风发的意气及沙场上的军功给予了激赞,而在字里行间则隐含着一种对“五陵豪”恃宠而骄、草菅人命、军功在身而不可一世等行为的厌弃和对他们靠祖荫、斗鸡而获宠的轻视情绪。如果说在《白马篇》中,李白对“五陵豪”的不满表达过于隐晦,令人不易察觉,那么在《行路难》其二中,李白的态度则是极为明朗的。诗中有云:“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。羞逐长安社中儿,赤鸡白狗赌梨栗。弹剑作歌奏苦声,曳裾王门不称情。淮阴市井笑韩信,汉朝公卿忌贾生。”<sup>[14]157</sup>此诗作于开元十九年初夏李白即将离开长安时。诗歌中,李白的情绪非常激动。他对此次长安生活进行了总结,坎坷艰难之感、愤然不平之情喷薄而出。在激烈的言辞中,“羞逐长安社中儿,赤鸡白狗赌梨栗”二句简直就对“五陵豪”的怒骂。在李白眼里,那些“五陵豪”只不过是些斗鸡走狗、声色犬马的市井之徒,而自己却曾与他们相驰逐,回想起来,真是一种羞耻。这是李白在功业理想彻底落空后的愤激之语,不免有所偏激和夸张,但也彻底暴露了他对“五陵豪”的真实态度。李白对“五陵豪”既有此不满,却依然与他们交游了两、三个月,目的所在,显而易见。同时,也可看到,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委曲求全的性质的。

### 三 李白与“五陵豪”的交游及“北门厄”遭遇

阐明了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目的,下面说一下李白与“五陵豪”交游的状况。这个问题,前辈学者时有涉及,如王瑶先生《李白》一书中主要列举了李白饮酒挥霍、轻财重义、抱打不平行为<sup>[1]26</sup>;王运熙、李宝均先生《李白》一书中说,李白“身骑骏马,腰横宝剑,昂昂然出入于通都大邑”<sup>[2]14</sup>;安旗先生《李太白别传》一书中说,李白“返长安后,仍然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,遂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,日以斗鸡、走马、任侠为事”<sup>[19]42</sup>;谢思炜先生《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》一文中说:“李白这段时期的生活,有时竟是那样落拓,连诗人自己也不讳言:斗鸡走狗,‘羞逐长安社中儿,赤鸡白狗赌梨栗。’”<sup>[10]</sup>如此等等,都是从李白的角度进行正面阐述,因资料不充分,故而皆为轮廓性勾勒。虽可对情况有大致了解,但毕竟不够具体。其实,换个角度,从“五陵豪”一方着眼,问题的认识就容易细致化了。也就是说,若了解了“五陵豪”的生活形态,也就基本上看到了李白与之交游的状况。

“五陵豪”,即京师禁卫之兵。他们当值时,是京城、皇城和宫廷禁苑的军士;他们不当值时,便任侠放浪于京师,就是人们眼中的“五陵豪”。所以,我们所要了解的“五陵豪”的生活形态,是指那些京师禁卫之兵在不当值时之日常。关于此,唐诗中描述颇众。兹选若干如下:

新丰美酒斗十千,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,系马高楼垂柳边。(王维《少年行》其一)<sup>[20]卷一百二十八,1306</sup>

玉剑膝边横,金杯马上倾。朝游茂陵道,夜宿凤凰城。豪吏多猜忌,无劳问姓名。(李颀《少年行》其三)<sup>[20]卷一百四十五,1466</sup>

斗鸡下社尘初合,走马章台日半斜。章台帝城称贵里,青楼日晚歌钟起。贵里豪家白马骄,五陵年少不相饶。双双挟弹来金市,两两鸣鞭上渭桥。渭城桥头酒新熟,金鞍白马谁家宿。可怜锦瑟筝琵琶,玉台清酒就君家。小妇春来不解羞,娇歌一曲杨柳花。(崔颢《渭城少年行》)<sup>[20]卷一百三十,1324</sup>

平明走马绝驰道,呼鹰挟弹通缭垣。玉笼金琐养黄口,探雏取卵伴王孙。分曹六博快一掷,迎欢先意笑语喧。巧为柔媚学优孟,儒衣嬉戏冠沐猴。晚来香街经柳市,行过倡市宿桃根。相逢杯酒一言失,回朱点白闻至尊。金张许史何颜色,王侯将相莫敢论。(李益《汉宫少年

行》》<sup>[20]</sup>卷二百八十二,3213

少年初拜大长秋,半醉垂鞭见列侯。马上抱鸡三市斗,袖中携剑五陵游。玉箫金管迎归院,锦袖红妆拥上楼。更向院西新买宅,月波春水入门流。(于鹄《公子行》)<sup>[20]</sup>卷三百十,3503

从这些描述中,不仅清晰可见“五陵豪”的日常生活内容:游冶、斗鸡、走狗、打球、饮酒、赌博、宿娼等等;也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“五陵豪”的生活场景:酒楼纵饮、大道驰逐、斗鸡下社、挟弹金市、鸣鞭渭桥、分曹六博、晚来香街、夜宿娼家等等;亦可如在眼前地触及到“五陵豪”放纵不羁、潇洒日月的意气。如此等等。以此为参照,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基本情形亦可见一斑。这样的情形,在人们眼中,往往会视之以浪游,但对充满侠气和心怀宏愿的李白而言,这一段生活则是他一生中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回忆。十多年后,李白还意气飞扬说:“忆昔作少年,结交赵与燕。金羁络骏马,锦带横龙泉。”<sup>[14]</sup>741

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未见有什么成效,而在交游过程中,他遭遇了“北门厄”。关于这件事,天宝七载(748),李白在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一诗中回忆道:

开吴食东溟,陆氏世英髦。多君乘古节,岳立冠人曹。风流少年时,京洛事游遨。腰间延陵剑,玉带明珠袍。我昔斗鸡徒,连延五陵豪。邀遮相组织,呵吓来煎熬。君开万人丛,鞍马皆辟易。告急清宪台,脱余北门厄。<sup>[14]</sup>822

此诗《全唐诗》有异文云:

开吴食东溟,陆氏世英党。夫子特峻秀,岳立冠人曹。风流少年时,京洛事游遨。珍馐红阳燕,玉剑明珠袍。一诺许他人,千金双错刀。满堂青云士,望美期丹霄。我昔北门厄,摧如一枝蒿。有虎挟鸡徒,连延五陵豪。邀遮来组织,呵吓相煎熬。君披万人丛,脱我如轳牢。此耻竟未刷,且食绥山桃。<sup>[20]</sup>卷一百六十九,1744

两段文字不知何者为正稿,所叙“北门厄”情况基本一致,可参看。原诗和异文皆为李白自述,所以历来是研究者认识李白“北门厄”遭遇的直接材料。但由于二者对致使李白遭厄的当事人的交代存在差别,且不甚明晰,而引起了学界的一些讨论。如瞿蜕园、朱金城先生《李白全集校注》在原诗“北门”一词下注云:“考《新唐书·兵志》:及贞观初,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,于北门长上曰百骑,……十二年,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。唐之北军为皇帝私兵,以屯于宫之北门,故以北军为号。疑李白以狎游之故,为北军人所窘,幸遇陆调以宪

府之力脱之。”<sup>[5]</sup>686 安旗先生结合异文分析道:“据《汉书·原涉传》:‘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节气者,皆归慕之。’又据李白《白马篇》:‘龙马花雪毛,金鞍五陵豪……斗鸡事万乘,轩盖一何高……酒后竟风采……发愤去函谷,从军向临洮……归来使酒气,未肯拜肖曹……’又据李白《少年行二首》(其一)‘因声鲁勾践,争博勿相欺。’故可知李白与之发生冲突者,乃长安游侠之徒,以斗鸡见赏于朝廷,并供职军中者。发生冲突原因,可能是在赌博中李白被彼等欺弄,发生冲突,结果李白大吃其亏。故二十年后犹耿耿于怀。赠陆调诗一本中有‘此耻竟未刷’之句。”<sup>[6]</sup> 谢思炜先生在《李白集校注》和安旗先生的基础上,通过“北门”一词的阐释对李白遭遇“北门厄”一事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。谢先生根据《旧唐书·王毛仲传》及《通鉴》景云二年关于北门四军的由来记载认为,唐玄宗为太子时,“北门”乃北衙禁军的称谓。“万骑(后称龙武军,改称龙武军的时间诸书所记不同,姑置不论)诸将因助玄宗平韦氏,被称作‘唐元功臣’,骤然显赫,‘北门’之称可能就是这时叫响亮的。”开元十九年,王毛仲被赐死后,“禁军的气焰大不如前了,安史之乱后逐渐变为宦官的工具。‘北门’似乎就是他们特别显赫的这段时间的称呼。……这段时间正是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,‘北门厄’应该就发生在这时。”进而,谢先生根据《王毛仲传》和《新唐书·兵志》中关于长安良家子为避征徭而纳资隶于羽林的记载分析道:“李白很可能即是受到这些隶于万骑的市井之徒的攻击,不大可能是真同万骑诸将发生冲突,否则,陆调以宪府之力恐怕也无法为他解脱。”<sup>[10]</sup> 问题的讨论不断推进,为认识李白“北门厄”遭遇极富参考意义。但学界所论,都重在和李白发生冲突者的身份揭示,事件的一些环节依然不甚清晰<sup>②</sup>。综合学界所见,结合李白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原诗和异文,笔者以为,李白“北门厄”遭遇应为如下情形。

(一)李白与“有虎挟鸡徒”之前应发生过一次冲突(冲突的起因很大程度上为斗鸡之事,即安旗先生所言之赌博)，“有虎挟鸡徒”吃了亏或起码未讨到便宜而心怀愤恨,后来纠集帮手,设计报复。因为,“有虎挟鸡徒”乃“邀遮相组织”,这个构陷行为便说明了问题所在。至于“有虎挟鸡徒”的身份,似乎更像是在籍军士。因为,从“有虎”一词的形容来看,其应是长期习武而体格健壮者。

(二)李白被算计,遭到围攻。围攻李白者,除“有虎挟鸡徒”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外,他者皆为禁军中的人,所谓“有虎挟鸡徒,连延五陵豪”。谢思炜先生认

为,李白“不大可能是真同万骑诸将发生冲突,否则,陆调以宪府之力恐怕也无法为他解脱”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,从李白对陆调的赞美中可见,陆调不仅有相当的家世背景,自身也风流倜傥,任侠京洛,交游甚广。不能因为禁军中的特殊身份,就认为陆调没有能力调停这次冲突。

(三)李白被围攻,以一敌众,情势非常险恶,所谓“摧如一枝蒿”。李白所以能脱离危难,全凭陆调之力。

陆调先是奋不顾身将李白从人群中救出,所谓“君开万丛人,鞍马皆辟易”;进而通过清宪台予以调停,最终将事件平息,所谓“告急清宪台,脱余北门厄”。这也充分表现出了陆调的勇猛、智慧和能力。

“北门厄”遭遇对李白的打击应是非常大的,因为此事件后不久,李白就满怀悲愤地离开了长安。从李白一入长安的行踪来看,迫使他在大愿未遂的情况下而含恨离去的也只能是“北门厄”事件。

注释:

- ①为李白诗年谱之著作,最早的是宋薛仲邕《李翰林年谱》(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九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8年),系粗陈梗概之作;后有清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(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三十五,中华书局,1977年),系李白诗年谱不过二百题;再有今人詹锳《李白诗年谱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年),系李白诗年谱近七百题,占总数几近百分之七十,并大致勾勒出李白一生行踪。随着李白研究的深入,尤其是李白“一入长安”说的逐步明晰,李白很多诗年谱创作的时间得以确定。安旗、薛天纬、阎琦、房日晰等先生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,编著成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(中华书局,2015年),所编排的李白诗年谱数量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,是目前最新、最系统的李白诗年谱著作。
- ②许嘉甫先生有《李白北门厄考述》一文(《祁连学刊》1991年第4期),认为李白因斗鸡杀死王毛仲手下的“羽林豪奴”而遭北门之厄,并对事件过程有详细的情节阐述,但皆为附会、臆解,如云李白与“羽林豪奴”因为斗鸡的争执上升到剑术的较量,并立下生死文书,一对一的较量中“羽林豪奴”连连败阵,于是群起围攻李白,李白在剑光闪闪中杀死一名豪奴后进而“手刃数人”,陆调用调虎离山之计保护李白等等,直似小说家言,故不在本文参考之列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瑶.李白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9.
- [2]王运熙,李宝均.李白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3]稗山.李白两入长安辨[J].中华文史论丛,1962(2).
- [4]郭沫若.李白家室考索[C]//郭沫若.李白与杜甫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2.
- [5]朱金城.后记[M]//瞿蜕园,朱金城.李白全集校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.
- [6]安旗.李白两入长安始末[J].人文杂志,1981(3).
- [7]郁贤皓.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[C]//郁贤皓.李白丛考.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2.
- [8]郭石山.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[J].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1982(2).
- [9]李从军.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[J].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1983(1).
- [10]谢思炜.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[J].西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3(3).
- [11]胥树人.北上东鲁和入长安[C]//胥树人.李白和他的诗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.
- [12]杨栩生.李白首次入京时间之考索[J].南京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85(2).
- [13]薛天纬.李白一入长安事迹之我见[C]//薛天纬.李太白论.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2.
- [14]安琪(主编).李白全集编年笺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
- [15]安旗,薛天纬.李白年谱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2.
- [16]阎琦.唐诗中的长安侠少和“恶少”[C]//阎琦.识小集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1.
- [17]安旗.李白诗新笺[M].郑州:中州书画出版社,1983.
- [18]杨齐贤(集注),萧士赟(补注).分类补注李太白诗[M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.
- [19]安旗.李太白别传[M].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2005.
- [20]彭定求,等.全唐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
[责任编辑:唐 普]